

曾庆瑞赵遐秋文集

第三卷 中国现代小说史（上）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曾庆瑞赵遐秋文集

第三卷

中国现代小说史（上册）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目录

题记	(1)
导论	(5)
一 描述中国现代小说的发展历史	(6)
二 按照发展的阶段划分历史时期	(13)
三 坚持历史主义的原则评论功过	(18)
四 政治艺术标准和真善美的价值	(24)
五 现实主义和其他思潮方法流派	(29)
六 巨匠大师名家和广大的作家群	(35)

第一编 先声（1896—1917）

第一章 从传统观念的束缚中求解放	(46)
第一节 启蒙思想家向传统观念挑战	(48)
第二节 改良派“小说界革命”深入发展	(56)
第三节 革命派颇有创见的小说理论	(65)
第二章 创作和翻译小说的一度繁荣	(72)
第一节 小说繁荣的深刻的社会原因	(73)
第二节 近代文学中创作小说的繁荣	(81)
第三节 近代文学中翻译小说的繁荣	(89)

第三章 向现代小说的内容形式过渡	(98)
第一节 小说创作的反现实主义逆流	(99)
第二节 现实主义挣扎在历史曲折中	(108)
第三节 启蒙作家呼唤新小说的诞生	(115)

第二编 诞生（1917—1921）

第四章 催生现代小说的理论动员	(128)
第一节 突破旧形式对新文学的束缚	(130)
第二节 探索新时代的小说创作理论	(140)
第三节 净化旧派小说污染了的园地	(148)
第四节 摄取外国新小说的异域营养	(155)

第五章 《狂人日记》的呱呱坠地之声	(164)
第一节 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先驱	(166)
第二节 救国救民的一声痛心呐喊	(173)
第三节 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	(180)
第四节 为现代小说探索艺术道路	(188)

第六章 诞生时期的启蒙小说新作	(198)
第一节 有所为而发的《新潮》作者群	(200)
第二节 冷静地谛视人生的叶圣陶	(209)
第三节 “五四”惊雷震上文坛的冰心	(215)
第四节 一些早起者所留下的足迹	(223)

第三编 成长（1921—1927）

第七章 鲁迅写中国革命的“呐喊小说”	(237)
第一节 “会有阿Q似的革命党出现”	(239)
第二节 “梦醒了无路可以走”的悲剧	(246)
第三节 最清醒的现实主义的伟力	(253)
第四节 典型化和创新的民族艺术	(261)
第五节 继往开来的独特历史贡献	(270)

第八章 文研会探索人生的“问题小说”	(279)
第一节 人生问题和“为人生”的思潮	(280)
第二节 从学生书房走向十字街头	(289)
第三节 憧憬“美”和“爱”的理想的天国	(298)
第四节 苦闷彷徨焦灼的热情呼号	(307)
第五节 市民意识和迷惘的心理	(316)
第九章 创造社表现自我的“身边小说”	(326)
第一节 浪漫主义和“私小说”的影响	(328)
第二节 尊重自我提倡反抗的气质	(337)
第三节 重压下弱国子民的时代病	(345)
第四节 灰暗忧郁和变态的性心理	(356)
第五节 倾向社会性人生的“客观化”	(365)
第十章 流寓者植根乡野的“乡土文学”	(376)
第一节 被生活驱逐到异地的人们	(378)
第二节 喊出农村衰败的一声悲叹	(387)
第三节 点缀着冷酷的野蛮的习俗	(396)
第四节 在悲壮的背景上加了美丽	(405)
第五节 隐现着乡愁的伤感故乡风	(413)
第十一章 涓涓细流汇入现实主义大潮	(423)
第一节 文坛“大转变时期”何时来呢	(425)
第二节 中国容不得“为艺术的艺术”	(434)
第三节 为花木作泥土的小说家群	(445)
第四节 海峡彼岸呼唤祖国的心声	(454)
第五节 革命现实主义小说的胎动	(463)

题 记

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各体文学里，新诗起步最早，散文小品成熟最快，戏剧文学受外国影响最明显，而小说，则作家队伍最庞大，作品数量最丰富，反映生活最为深广，艺术成就最是杰出，它拥有读者之众多，发生社会影响之强烈，恐怕都是居于各体文学之首位的。如果我们说，对小说发展历史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影响到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这话恐怕不算过分。

有鉴于此，人们深深感到，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这个学科领域里，小说史的研究应该引起重视，应该取得成就，应该达到相当的水平。

建国以来，我们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教学和研究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风雨道途，曲折坎坷，距离一个比较理想的科学水平，我们显然还有一段不短的路程，现代文学史这门学科显然还存在着许多问题。即以小说史而论，在国内，我们几乎还没有认真地进行过专门的研究。

好在，“相期更看水流处，步履未倦夸轻翻。”随着新的历史时期的到来，在社会主义学术文化事业繁荣形势下，我们拥有数千人的一支中国现代文学史教学和研究人员的^①，已经迈开坚定的步伐向着这门学科的新水平、新境界前进了。

就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我们涉足这个领域，尝试着撰写了这部

^① 1982年5月下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在海南岛海口市举行第二届年会，大会自豪地宣布，全国（未含台湾省统计数）从事本学科教学及研究工作者，已达四千人之多。

《中国现代小说史》。

我们设想，一方面，作为专业用书，它可以应急，可以先在学校里把这门课程开设出来，以便先行满足中文系及其他系科一些学生的求知欲望；另一方面，要是还能称得上是一部学术著作的话，它也算是一块引玉之砖，总可以先在各体文学史的研究和撰写工作中再向人们提供一个评头品足的对象，以期集思广益，大家齐心协力，以寄望于高明的手笔，重新写出一部高质量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专著，以至重新写出一部崭新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来。

我们力图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之下，从中国现代小说文学的历史出发，把这部书写好。只是，由于科学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著作没有成例在先，我们在整个学科体系的构想上还缺乏借鉴。还有，多年的非马克思主义倾向造成的文学史实发掘和研究工作的混乱，也加大了我们工作的难度。加之，光阴荏苒，岁月蹉跎，十年动乱结束，待到我们把笔用功，已经人到中年，逝去了的年华在我们的知识积累中留下了相当大的空白，此时此地，依旧蹒跚学步，仍然稚气十足，勉力为之，我们实感功力不够。这样，书中的缺点和错误，也就难免了。

万幸的是，文学界老一辈作家和学者，我们师长一辈的专家教授，还有我们同一辈的一些研究工作者，以及不少的年轻朋友们，为我们这个学科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研究成果。本书写作过程中，我们多所学习，不少借鉴，获益匪浅。这又使我们能够避免一些缺点和错误。对此，本书虽未一一列名致谢，但由衷的敬意却是永在的。

本书主体正文，计有六编二十二章共九十六节。第一编《先声》，叙述晚清和民初二十余年小说发展状况，考察现代小说直接的历史源头。第二至第六编《诞生》、《成长》、《繁荣》、《战斗》、《转折》，按五个阶段详述中国现代小说的历史发展过程。

主体正文之前，设有《导论》六题，用以阐明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学科性质、对象、任务，研究工作中的史料学和方法论问题，以及各个方面、各种角度的研究原则。

主体正文之后，设有《余论——回顾与展望》六题，试图就中国现代小说的革命战斗历程，现实主义道路，宝贵艺术经验，吸取外国文学营养，对批评和创作的关系，作一总结，并且阐明，中国现代小说史的丰硕成果，正是社会主义时期中国当代小说的一个坚实的历史出发点。

确定这样一个课题之后，我们共同作了史料工作的准备，探讨了全

书的著作思想和准则，构想了全书的总体框架，而后分头执笔撰稿，再共同定稿，所以，共同对全书负责。

分工执笔撰稿的情况是：

赵遐秋——第一、二、三编，又《余论》；

曾庆瑞——第四、五、六编，又《导论》。

本书酝酿和写作过程中，北京、上海、江苏、山东、陕西、甘肃、内蒙、河北、湖北、广东、广西等地的一些专家、教授和有关同志，曾有宝贵的指导。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和中文系的领导和有关同志，特别是人大出版社编辑张晨同志，为本书的审定和出版做了许多工作。我们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1982年12月10日于

北京西郊中国人民大学林园寓所

导 论

本书所说的中国现代小说，是指1917年文学革命至1949年新中国诞生期间中国现代作家创作的现代小说作品的总和。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它经历了三十余年的发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

对中国现代小说发展的历史进程作一个总体的回顾，并且努力去对这一历史的文学现象作出恰当的评价，总是先要确立某些足资依循的轨迹和可供丈量的尺度的。

这种轨迹的描绘，这种尺度的规范，当然都不是人的头脑可以凭空造作和先验论定的。那是中国现代小说从孕育、诞生到成长、繁荣并继续发展的生动史实客观地显示出来的。文学史家们的作为就在于，准确地把握住这样的显示，凭借人的认识的能动作用，给历史的本来面目、本质和一些规律性的东西作出理论性的说明。所谓描绘、规范云云，不过如此而已。

当然，所有的这一类理论性的说明，又都需要经受小说文学历史事实的检验。凡是不确切的，甚至错误的，都可以匡正，也必然会得到匡正。

基于这样的理解，在描述和评说中国现代小说发展的历史情景之先，本书要把某些足资依循的轨迹和可供丈量的尺度具体化为以下六个方面的问题，预作简要的说明。

这六个方面的问题是：

一、中国现代小说史是一门什么性质的学科？哪些历史的文学现象是它的研究对象？学科任务是什么？其史科学和方法论的原则应该如何去掌握？

二、中国现代小说发展的历史应该怎样划分时期？具体地说，什么样的划分最接近于历史的本来面目？

三、对于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作家、评论家，应该怎样去评论他们的是非功过？在作出这种评论的时候，我们需要纠正的偏颇有哪些？

四、对于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作品，应该怎样去评论各自的价值？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如何掌握？社会认识价值、功利价值和美感价值如何协调？

五、这一段历史上的各种文学思潮、创作方法、艺术流派，按照什么样的原则确定彼此的不同地位为好？其间的关系应该如何摆正？

六、这一段历史上的各类小说作家，按照什么样的原则确定彼此的不同地位为好？其间的关系又应该如何摆正？

一 描述中国现代小说的发展历史

中国现代小说史就是描述中国现代小说发展的历史过程的一门文艺科学。这里说的描述，是考察、研究的结果在文字上的科学表述。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学科领域里，它属于一门分支学科，是一种各体文学史。

在整个文艺学领域里，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一部分，它又归属于文学史一大门类，而区别于文艺理论和文学批评。

它，不言而喻，是在社会科学范畴之内。而就社会人文科学的总的体系而言，它又兼具两种属性：是文艺学中的史学部分，又是历史学中的文学部分。

19世纪丹麦文学史家勃兰兑斯断言：“文学史，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①这不确切，当然，也不科学。中国现代小说史不能说是中国现代史时期中国人的灵魂的历史。中国现代小说确实描绘了许多人物，表现了这一时期的中国人的种种感情和思想，揭示了他们的灵魂，却又都只是透过这些人物，透过他们的感情、思想、灵魂去不同程度地反映这一时期的中国社会生活的。

以往的三十余年间，中国现代小说对于中国人的灵魂的揭示，倒也

① 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引言》。

有过历史性的变迁和发展。比如，鲁迅笔下的贫苦农民，以及当时受他影响的一代作家许钦文、蹇先艾、王鲁彦、台静农等人笔下的贫苦农民，固然都浸染着作家的炽热同情，却又备尝苦难而仍不觉醒。无论男女老少，那被压榨得变了形的躯体里，灵魂上一般都负荷着落后、愚昧以至冷漠、麻木的创伤，阿Q的“精神胜利法”就是这种创伤的极致。不久，茅盾、王统照、艾芜、丁玲等作家，在30年代初，就揭示了农民、特别是青年农民，由不安、朦胧到觉醒、抗争，以至于奋起革命的灵魂。抗战开始，姚雪垠、艾芜、吴组缃、丁玲、刘白羽、杨朔等作家的小说，揭示的农民灵魂、落后意识和习气正在战斗的集体的生活中得到改造，而逐步代之以崇高的民族气节，勇敢的战斗精神，质朴的思想气质，倔强的人物性格。等到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开始了中国现代文学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赵树理，以及和赵树理共同作出努力的作家孙犁、欧阳山、丁玲、周立波、刘白羽、杨朔、柳青、马加、康濯、马烽、西戎等人，在一群崭新的男女老少翻身农民形象里，展现的人的灵魂就是美丽而又纯真的灵魂了。思想、感情、习性、气质，以至于仪表、神态、言谈、举止，都显得那样富有做社会生活主人公的幸福感和欢快心境，那样充满创造历史的责任心和主动精神，那样洋溢着欣荣向上的英俊朝气和勃勃生机。他们在新文学人物的艺术画廊里，用缤纷的彩笔给历史留下了动人的印象。中国现代小说史理所当然地要考察、研究并全面而又深入地描述这种历史的文学现象。

然而，中国现代小说史又不能只是满足于这样的考察、研究和描述。仅仅致力于这样的工作，那倒真成了某种心理学类的学科了。拿上述中国农民的精神面貌的不同写照来说，中国现代小说史在考察、研究并作出恰当的描述的时候，还必须从一切社会生活条件的各方面因素去说明这种现象是如何发生的。为什么必须这样做？道理很简单。因为，文学，究其实质，乃是社会生活的形象的反映。文学的发展是深受社会发展的影响和制约，由社会历史的发展所决定的。现代史时期的中国农民的社会地位、劳动和斗争，在不同的阶段以不同的方式反映到小说创作里，这就决定了作品中农民形象的不同特征。当然，文学的发展又有其自身的继承与创新的规律。中国现代小说史除了必须从一切社会生活条件的各方面因素去说明农民形象的不同精神面貌，还必须说明，鲁迅告别了旧文学传统，严格遵循现实主义，把普通农民当作小说中的中心人物、主人公加以描写之后，他的艺术经验又如何哺育了追随在他周围

的一些青年作家，这些青年作家创作的一类小说——“乡土文学”，又如何按照同一种艺术倾向，描绘了本世纪最初一二十年的农民形象。当然，也还必须说明，此后，现实主义以至革命现实主义，典型化的法则，民族的艺术形式，其中包括语言的修养，又都是如何在第一代、第二代和第三代作家之间传递着影响，到赵树理一群作家手中逐步完善，因而取得了越来越可喜的创作成果。

这就是我们不同于勃兰克斯的文学史观。

明确地讲，把小说看作是一种各体文学，把中国现代小说史看作是一门历史的文艺科学，它的学科性质不是心理学的。文艺学和心理学的关系，但是，文艺学就是文艺学，它是独立的。除了探寻小说中留下的民族心理的印记，更重要的是，中国现代小说史要发现并且指出，中国现代小说创作的某一种思想和形式是如何必然地为另一种思想和形式所代替的，代替过程中发生了什么情形，其间的规律如何。

鉴于勃兰克斯的大文学史家的权威地位及其赫赫大名所产生的影响，我们在这里划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和心理学的界线，完全是必要的。当然，正确地认识这门学科的性质，还有两种十分偏颇的文学史观应该注意纠正。

一种偏颇，是当代美籍华人学者夏志清在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一书里表现出来的。夏志清批评别人强调社会历史观念是把文学当作了“历史的婢女”^①。他说他“不容许事先形成的历史观决定自己对文学美的审查”。夏志清认为：“文学史家必须独立审查研究文学史料，在这基础上形成完全是自己的对某一时期的文学的看法。对文学史家说来，一位向时代风尚挑战的、独行其是的天才，比起大批亦步亦趋跟着时代风尚跑的次要作家，对概括整个时代有更重要的意义。”从这一观点出发，夏志清把别人所说的“文学的社会功能”、“文学的历史使命”、“作家的意图”等等，一概斥之为“意图性的错误”。

夏志清显示的是一种特殊的价值观念。他的文学史观是不正确的。

^① 这是夏志清在反驳捷克中国学家普实克的文章《论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科学”研究并答普实克》中说的话。普实克在1963年发表长文《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根本问题和夏志清的中国近代小说史》，批评了夏志清在他的《小说史》书中的政治偏见和错误的研究方法。夏文即针对此文而发。这是60年代初西方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一场重要论争。下面引出的夏志清的见解，都出自上文。两人原文均载当时荷兰莱登出版的东方学杂志《通报》（Tóng pào）。本书中文引文，取自尹慧琨、尹宜译文。

事实上，他有他自己的特定的功能、使命和意图。据此，他对中国现代小说史上众多的作家和作品作了错误的评价，并且坚持认为“中国现代小说的水平一般来说是平庸的”。这是他的偏见。

另一种偏颇，出现在 50 年代中期到 60 年代中期中国现代文学史界。为了反对忽视社会历史的倾向，反对只重艺术形式的倾向，那时有一些著作简单地理解了文学和政治的关系，文学和社会历史的因缘，而对作家作品的社会使命和功能作了庸俗社会学的表述。那也不是正确的文学史观，也是不可取的。

毫无疑问，中国现代小说史应该解除各种各样的偏颇。它是一门既审查中国现代小说社会功能又审查中国现代小说文学美感的学科，更是一门审查这种社会功能和文学美感如何结合又如何发展的学科。

明确了这样的学科性质，我们还要解决一个体例的问题，也就是要选取一个恰当的考察、研究以及描述的角度问题。

按照一般的历史科学通例，要考察、研究并描述中国现代小说的发展历史，可以有以下不同的角度：

一是编年纪事，逐年逐月逐日逐项排出中国现代小说的作家作品发生和发展的事件、现象，这兼具编年史和纪事本末史的特点；

一是人物纪传，按小说家分篇评述其创作历程并予评点；

一是资料长编，依作品分篇评述其创作情形及价值审定；

一是正史纂修，综合各种因素，从总体上考察、研究并描述中国现代小说发展的面貌。

这最后一种，又可以有如下各类：

一是断代史，如“五四”时期小说，左翼十年小说，抗战前期小说……；

一是地区史，如东北沦陷区小说，上海“孤岛”小说，台湾小说……；

一是专题史，如文学研究会探索人生的“问题小说”，创造社表现自我的“身边小说”，抗战前期国统区的“暴露与讽刺”小说……；

一是通史，即包括各段时间、各个地区、各种专题等全部中国现代小说文学现象在内的总史。

本书采用的体例，为最后一种的最后一类，即：综合各种因素，对现代史时期的各段时间、各个地区、各种专题的小说现象作总体的考察、研究和描述，是通史一类的正史。

按照这样的性质和体例，中国现代小说史研究的历史的文学现象，应该包括一切和小说的发展有关的文学现象。具体地说，有受着社会生活制约的如下六个方面：

- （一）文学思潮（包括文学批评）；
- （二）文学运动（包括文学论争）；
- （三）文学社团（包括报刊及出版）；
- （四）小说流派；
- （五）小说作家；
- （六）小说作品。

由于作家作品是文学形象地反映社会生活的主要体现，也是人们衡量一时一地文学成就大小的主要标志，上述六个方面里，小说作家和小说作品应该成为主要的对象。但是，这并不是说，小说史就是小说作家和小说作品的历史。把一种文学的发展史改变为作家、作品评论的汇集，总是不妥当的。

考察和研究这些方面的小说文学现象，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学科任务，是研究中国现代小说的发展过程和规律。首先，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真实而又科学地描述中国现代小说发展的过程。其中包括各种有关现代小说的史料的挖掘和整理，各种有关的思潮、运动、社团、流派的是非功过的评价，各种作家作品的评价。影响并推动那时小说发展的各种社会因素，当然也要加以描述。这足以引导我们的年轻一代如何去认识中国现代小说发展的历史。

其次，作这样的描述，还要尤其注意研究小说发展的规律，总结小说发展的经验。历史不仅昭明既往，还启示着未来。无论历史的经验具有普遍的意义还是只表现着作家独特的艺术个性，都将成当代小说向前发展的有益借鉴。正因为如此，像任何一门学科都要为现实的社会生活服务一样，中国现代小说史也要使自己总结的历史经验服务于我们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繁荣，服务于社会主义高度精神文明的建设。

实现这样的任务，要求研究者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作思想指导，有中国人民的革命立场，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论。

在这样的前提下，还要有史科学和方法论的功力。

史科学是历史科学中的一个部门。要衡量中国现代文学史，其中当然也包括衡量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学科成熟程度，应该包含有这样一个标

准，即看它是否形成了相对独立、相当完备的史料学。

和其他学科一样，中国现代小说史所要面对的史料也有两种：

一种是各个阶段直接遗留下来、保存至今的小说作品，有关作品的批评，有关小说的论著，有关出版和发表这些作品、批评、论著的书局及报刊资料，有关作家的实物及文学论著，这是原始的史料；

另一种是别人对于这些原始史料的转述或回忆，这些转述或回忆多经过一次转手，可靠程度要比原始史料差一些，这是辅助的史料。

我们要重视史料，尤其要重视原始的史料。不掌握史料，不认识史料，我们就没有感性的认识，就不会有小说史的结论。

研究中国现代小说史，在史料方面要做这样四步工作^①：

第一步，收集史料。收集史料的要求是“全”。

第二步，审查史料。审查史料的要求是“真”。

第三步，了解史料。了解史料的要求是“透”。

第四步，运用史料。运用史料的要求是“活”。

史料的“真”包含两层意思：

一是去伪存真；

二是寻本求真。

比如，1932年3月20日，上海月明书店出版了一本叫做《三对爱人儿》的短篇小说集，内收《归来的道上》、《北老儿》、《三对爱人儿》等7篇作品，卷首有序。标明印数“一千五百”。书面上作者署名为“蒋光慈著”。可是，蒋光慈并没有这些作品。一审查，真相大白了。原来，1931年4月20日，上海联合书店早就出过一本《三对爱人儿》。内收作品，书的页码、版式、装帧、封面设计以至书名的字体，都和署名“蒋光慈”的那一本一样，印数也是一千五百。只是署作者大名为“邹枋”，书前另有谢六逸和黄天鹏写的两篇序，黄序是偏重于介绍作者情况的。上海月明书店的改造功夫，是在删去黄序，斩去谢序的脑袋“谢”字，并将谢序的写作时间由3月改为2月，用“蒋光慈”的大名换下“邹枋”二字，再就是把原来的蓝色封面改成了淡红^②。这就要求我们，研究蒋光慈的时候，要做去伪存真的工作，不要上了旧社会书商的当。

① 这里参照了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初稿》一书的见解。

② 这里引用的是张大明《踏青归来》一书的审查结论。

又比如，蹇先艾有一篇短篇小说《水葬》，写一个叫做骆毛的穷苦佃户，被地主“绅粮”周德高退佃以后，报复了周德高，偷了他家的东西，犯了杀身之祸，按贵州乡间陋俗，要被活活地推下江河淹死。这被美其名曰“水葬”。“执刑”的路上，骆毛有一些咒骂围观的人群的话。解放后，蹇先艾在编选他的《短篇小说选》时，对于这些咒骂的文字作了较大的改写，和他1926年版的《朝雾集》一比，人物、以至整个作品的思想，都显得拔高了^①。对于研究历史来说，这是需要加以甄别的。我们的小说史研究，总要以最早的版本的作品为根据，要追寻其“本”，依其“本”而求其“真”。

版本的问题是文学史领域里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著名的老舍名作《骆驼祥子》，初版本和现行版本就有重要的差别。那里面的重大修改，可能有助于我们了解老舍的思想艺术发展变化，并非没有价值。但了解《骆驼祥子》的原貌，还是我们这门学科的首要的任务，修改本不足为凭。

关于方法论，我们可以从原则上指出以下需要注意的几点：

第一，要坚持研究人类社会历史的基本方法——阶级分析的方法。在对三十余年间的有关中国现代小说的任何文学现象做任何估计时，都必须直率而公开地站到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群众的革命立场上，牢牢把握住社会阶级斗争形势的变化、把它作为基本的指导线索。

第二，要坚持从历史的事实出发、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的方法。在对三十余年间的有关中国现代小说的任何文学现象做任何估计时，抽象的文艺理论的概念代替不了具体的东西，文学史的一般原则绝不是我们的出发点，专靠一些公式是办不了什么的。

第三，要全面地看问题，实行综合的、比较的研究。一篇或者一部小说，一个或者一群人物形象，单纯从美学的观点看，只看作是一件艺术品，它可以说是一个独自存在的完备的整体，似乎是和周围的世界没有什么联系的。但是，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它却透露了作家思想的特点和艺术的个性，而这种思想特点和艺术个性，又只是那时整个创作环境的某一具体表现。这所谓创作环境，自然包括时代、社会和政治生活及思想、文化和文学气氛。辩证法总是要求从相互关系的具体的发展中来全面地估计这种关系的。这相互关系，就是一种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

^① 对此，本书第十章第三节《点缀着冷酷的野蛮的习俗》将有具体说明，这里从略。